

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白华山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摘要: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文章通过对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揭示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关键词: 杜月笙;上海市地方协会;资产阶级;国民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虽不领衔,但其势力则远在领衔的市商会之上,因为地方协会的会员,包括各界各业的上层领袖人物,其主张带有相当代表性”。^①30年代前期,在会长史量才的领导参与下,地方协会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对国民党政权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激烈地抨击与质疑,表现出了鲜明的民主进步倾向。^②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不久,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当上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会长。本文试就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进而对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2月4日,地方协会召开紧急大会,选举杜月笙为会长。15日,杜正式就任会长职务。

收稿日期:2002-03-10

作者简介:白华山(1973-),男,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杜月笙跻身上海社会上层,成为地方协会会长,一跃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对地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杜月笙投资金融工商业,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利益上与上海资产阶级有着共鸣的基础。杜月笙在“四·一二”政变后,开始调整活动方式,将活动重心由鸦片贩卖、经营娱乐业转到投资金融工商业上。1929年建立中汇银行,“这是杜月笙生平第一次规规矩矩办的事业”。^③以此为起点,杜月笙不断在金融界拓展势力,同时利用各种手段与江浙金融财团中的实力人物建立关系,如1931年陈光甫的商业储蓄银行发生挤兑风潮,杜月笙动员工商各界集资200万元,并亲自携带100万元去储存,风潮遂告平息,陈光甫自然对杜感恩不尽。此外,上海金融界的巨子张公权、钱新之、唐寿民、秦润卿、胡鼎昌、周作民等人也与杜建立起各种关系,其中钱新之还成为杜的密友,这些人多是地方协会的理事,这对于杜被地方协会承纳很有关系。

在工商界,杜更是凭借其权势,巧取豪夺,先

是收买华丰面粉厂,继之当上大达轮船公司等 30 多个企业的董、理事长。这样,杜月笙就在金融工商业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尽管很难说他已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毕竟具有了与这个阶级共鸣的经济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双重支持,黑道人物亦官亦匪的双重身份,众多三头六臂的帮兄帮弟、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为其活动张目,华洋杂处、三界分立的特殊社会环境,加上工于心计、灵活多变的处事风格,使得杜月笙成为 30 年代上海黑社会当之无愧的领袖,“三百年帮会第一人”。而这一时期,一些资本家为了借助黑社会的势力以调解工潮、抵挡来自外部的压力,更是纷纷请杜担任企业、同业公会的理事或董事,据统计,当时杜月笙各种董事长或常务董事的兼职头衔多达 75 个,^④其中金融近 10 家,工商 30 余家。这种“贴门神,避小鬼”的做法使得杜月笙在上海资产阶级中的权威大增。

而同一时期,地方协会因会长史量才被刺而元气大伤;经济的衰落、破产,又使得来自金融工商各界的多数成员更加缺乏颀颀当局的信心与底气。在这种群龙无首、前途茫茫的局面下,杜月笙无疑成为地方协会的希望,成为它回避各种打击的“门神”。因此,杜月笙当选为地方协会会长,既是他“力贯三界”的势力使然,更是地方协会生存策略的一种考虑。

第三,杜月笙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时期的表现赢得了较高的威望,从而获得上海资产阶级的信任。上海市地方协会是由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而来的,地方维持会成立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从事于慰劳将士、救济难民、调剂难民、维持商业及其他必要工作,以地方秩序恢复之日为止”。^⑤当时,杜月笙任维持会的副会长,由于他有着庞大的社会关系和强大的帮会势力,并且为人慷慨大方,所以不仅为地方维持会捐献、劝募到大量的物款,某种程度上还成为地方维持会与上海市政府进行沟通的中介,正如市长吴铁城所言:“予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⑥通过参加地方维持会,援助淞沪抗战,杜月笙在当时各界中获得了较高的威望,19 路军撤离上海之时,军长蔡廷锴设宴招待

各界,蔡曾向杜月笙敬酒,称其为“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⑦

另外,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史量才、黄炎培等,不甘心受国民党的摆布,希望能够利用杜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来与国民党政权折冲周旋,于是,他们主动结交、推崇杜,这无疑使得杜在上海资产阶级中的地位更形增高。

作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杜月笙在参加地方政治运动时,势必要考虑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国民党对上海资产阶级压制的逐渐加深以及对杜月笙不断加以笼络,杜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越来越恭顺,其政治态度的游移也越来越小,这在 1934 年后地方协会参与的一些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1934 年中期,美国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当时,银元在国际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银价的提升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仅 1934 年 6 月至 10 月短短的 5 个月里,上海流出的白银就有 220,900,000 元,是上年同期的 3 倍。上海各银行的存根总数 1934 年 3 月为 589,400,000 元,同年 12 月则减少到 335,000,000 元。^⑧白银外流造成的一个最直接后果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相继倒闭。1934 年,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钱庄倒闭者一共 425 家,因经营困难而改组的达 1383 家。1935 年,全市倒闭的工厂有 187 家,商店 422 家,银行、钱庄 87 家,加上经营地产的公司和营造厂等其他行业,全市共倒闭工商企业 895 家,比 1934 年整整多了一倍。^⑨

经济的凋敝、破产,使得上海工商业资本家度日如年,他们吁请政府改善金融环境,给工商业的发展以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政府却无意肩负起此重任,而是把企业家的怒火引向江浙金融财团,为他们吞并、改组各银行提供借口。

1935 年 2 月 1 日,地方协会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临时救济市面,而中国、交通等银行也尽量收受抵押共放款 600 万元救济市面。^⑩13 日,地方协会发起讨论救济经济的会议,当时,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杜

月笙按照事先与孔祥熙商量的步骤,提议:应由中国、交通、中央三银行组成三银行财团,发放贷款救济工商业。但中国、交通两银行不愿担负责任,提议应由中央银行单独负责。^⑩在获悉金融界的态度后,陷入困顿的上海工商界“责银钱业不救济,酝酿罢业”,^⑪上海市民联欢会也主张罢市,“以惩银行之不肯放款工商业”。^⑫此后,地方协会理事会在杜月笙主持下,又连续三次召开特种委员会会议,并邀请一些大银行家参加,讨论救济经济的建议。在2月28日地方协会召集的会议上,杜月笙又重申了救济经济的主张,而孔祥熙则不断从南京发出通电敦促实行。^⑬

3月9日,孔祥熙来到上海,孔在杜月笙的中汇银行与地方协会特别委员会协商救济工商业的事。在孔的催促下,尽管上海的银行家们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出500万元的救济款。杯水毕竟解不了近渴,于是,银行家们“过分谨慎和保守”的表现,^⑭就成为孔发动“银行事变”的借口。

3月23日,孔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必须增资,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3月30日,在孔祥熙等人的软硬兼施下,中国银行组成新的董事会,在7名董事中,官股7名,其中杜月笙独占一席。4月20日,交通银行组成新的董事会,杜是其中一员。随后银行改组接踵而至,至1935年底,南京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金融的垄断,昔日财势赫赫的“所谓江浙财阀解体,沦为四大家族的附庸”。^⑮

可以看得出,在南京政府完成对上海金融界控制的过程中,杜月笙操纵地方协会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杜月笙却成为最大的收益者:中国、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通商银行董事长、财政部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常委、货币储备局董事、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等等。种种官方或准官方的头衔的获得,表明杜已经成为南京政府极力加以笼络或利用的对象,而杜“官方身份”的获得,又注定了他不可能与失落的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上此呼彼应。应当看到,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江河日下,但自身的利益却注定了上海资产阶级不会装聋作哑、甘任摆布。从1935年始,地方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就出现了妥协与抗争相交织的画面,这幅画面真实地映照出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上海政治舞台上各种利

益实体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

三

随着1935年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地方协会开始以各种方式卷入抗日救亡浪潮,由于政治利益的分野,其内部成员在运动中也表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一致。

(一)绥远劳军 1936年11月,日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率所属部队奋起抵抗,并赢得百灵庙大捷。绥远抗战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各地纷纷支援。11月17日,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航业公会、红十字会等6团体在市商会集会,决定由6团体合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筹垫十万圆援助绥远前线。^⑯23日,受地方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委托,黄炎培、王晓籁、颜福庆、庞京周、陆京士、林康侯、罗又玄、王守清(王晓籁之子)等8人从上海乘张学良的座机“播音号”启程,前往绥远慰劳。26日,绥远劳军归来,黄炎培等一行人又去洛阳见蒋介石,告之前方军士有抗敌决心,但急需寒具。^⑰蒋介石则向他们承诺:“察北问题有办法,有决心,华北问题决不迁就。”^⑱当晚,黄炎培等人返抵上海。

如果说,在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某些官方人士如孙科、张继、居正等人的倡导下,地方协会绥远劳军的行动还能表现出一致,那么,在接下来的“营救七君子运动”中,地方协会的行动则明显地出现分流。

(二)“营救七君子运动”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是为“七君子事件”。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的这一逆行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营救七君子的运动。地方协会里的大多数资产阶级人士尽管对七君子之狱非常不满,但明显缺乏反抗的勇气,只是要求当局“依法办理”此案。^⑲虞洽卿、王晓籁、江问渔等分别前往公安局探望被捕者。地方协会里的银行家徐新六、林康侯、吴蕴斋、秦润卿等十余人联名通电要求释放同为地方协会会员的银行家章乃器。^⑳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与会员银行家李馥荪则百般周旋加以营救。

1937年端午节,黄炎培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被羁押的七君子,激于义愤,为他们在画册上题诗一首,“瀕洞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扣圜门。长城万里云千树,随意挥毫壮国魂。”^②

但是,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则明显地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为其效劳。救国会运动兴起后,杜月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胁迫邹韬奋去南京晤蒋。^③1936年11月,上海十万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当杜月笙等人得知救国会是罢工运动的后盾时,就串通CC分子,坚持把“七君子”送进反省院,再由他们保释出来,以此达到搞臭“七君子”的目的。^④1937年4月,苏州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罗织“十大罪状”,对沈钧儒等七人提起公诉。起诉书下达不久,杜月笙、钱新之即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伦的授意下,去苏州监狱,对沈钧儒等人表示,只要他们答应以后不再从事救国活动,去国外或留居京中,即可撤回公诉。沈钧儒等人断然拒绝了杜、钱的劝告,并多次致函给二人,申述其坚定不移的救国主张,“为国家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其永留史册”。^⑤6月13日,杜、钱二人又会同黄炎培、张季鸾等人去苏州,安抚七君子不要性急,并说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与他们并没有根本的分歧。^⑥但七君子仍不为他们的言语所动。在沈等人的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

(三)地方协会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消息传到上海,在资产阶级中引起极大震动,地方协会副会长王晓籁“忿懑欲决”,痛感“贻害国家,莫此为甚”,^⑦12月14日,地方协会与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轮航业公会等4团体联电张学良,吁请张学良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保卫蒋公安全,珍惜国家元气,和平奋斗,以救中国”,同时另电阎锡山,要他一面继续支援绥远抗战,一面设法营救蒋介石出险。^⑧15日,地方协会在获悉蒋介石安全没有问题时,又强调当前的工作是营救蒋介石和支援绥远抗战。《申报》、《新闻报》也发表时评,主张“审慎而坚决”地援救蒋介石。17日,地方协会三会长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联名电告张学良,表示愿意去西安当人质,换回蒋介

石。^⑨地方协会的通电均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但它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顺应了当时形势的发展。

(四)其他活动 1935年,申新七厂因无力偿还汇丰银行的借款而濒临困境,向政府借贷,政府漠然不管,2月26日,该厂遂被汇丰银行拍卖。该厂职工强烈反对拍卖,地方协会联合其他团体,会电政府,请求政府设法制止。^⑩在各界的反对声中,汇丰银行被迫取消拍卖。从1934年8月至1935年4月1日,地方协会两次派会员庞京周医师组织救护队前往江西广昌“剿匪区”,名义上是救护难民,实际上是为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助一臂之力,地方协会也因此被当地驻军各司令部及各机关赠银盾缎匾多件。^⑪

通过以上活动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尽管在某些场合地方协会还能够表现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倾向,如反对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等,但在杜月笙的主持下,该会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越来越恭顺,其独立性正逐渐减弱。尽管会中很多成员时有抗争,但失去了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撑,离开了会中成员的呼应,这种抗争注定是苍白的、无力的。对地方协会的控制,使国民党政府逐渐实现了对上海资产阶级的控制,而作为帮凶的杜月笙,自然也在国民政府中捞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以至有些研究者称他为“官方的有力人士”。^⑫

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各界酝酿成立一个后援组织,以作抗战的后应。上海市地方协会是由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展而来的,所以很多人包括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和国民党上海当局,都希望地方协会再次担负起重任,“再露身手,发挥效能”。^⑬但杜月笙极力反对黄炎培以地方协会为本体的要求,他希望成立一个扩大组织,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工作。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希望能够把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1937年7月22日,在杜月笙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多方筹划下,由地方协会、市商会、市农

会等500余团体组成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宣告成立,委员121人,常委35人,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陆京士、陶百川、汪伯奇等9人为主席团成员,该会特别强调:“本会既经成立,所有本市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救国性质团体单独行动。”^⑧这一时期,地方协会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总体领导下开展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慰劳将士。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市民闻前线杀敌捷报极兴奋,纷纷把食物等物品送交上海市地方协会,当时,地方协会转送前线之慰劳品达数千车之巨。9月以后,天气转寒,地方协会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大华舞场设立收品处,专门收受衣被干粮等物。10月11日,适逢国庆节,地方协会又电呈前方请派员提取抗敌饼50万枚、香烟50万支、绒线马甲500件,并派杨卫玉等人赴各伤兵医院慰问,送战地童子军茶点300份。^⑨

第二,救济难民。地方协会原设有救济组,后经上海市社会局倡议,与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红十字会等联合组成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主要办理难民事宜。该会设立并供给粮食者计有59所,加上其他机关设立的各种难民收容所,最多时全市有140余所。其中,地方协会曾设立一名为“慈愿收容所”的难民收容所,让难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教育自己,并用合作互助方式,组织生产自救,解决自己生活。^⑩随着战事的展开,难民越来越多,救济会又陆续遣送难民至杭州、苏州、嘉兴、湖州等处。此外,救济会还设立医药组,专理医伤疗疾之事。

第三,劝募救国公债。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浩大,决定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8月28日,上海市各界劝募救国公债总会成立,下设两个分队:商界方面,由市商会领导,组织上海市商界劝募总队;市民方面,由地方协会领导,组织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杜月笙任总队长,后杜又兼任了商界总队的副队长。经过杜的竭力奔波,5亿元救国公债,上海认购了7500余万元,折合美元达2300余万元,“上海市劝募之成绩,舆论备致赞扬”。^⑪

第四,救济失业工人,组织工厂内迁。战事发

生后,许多工厂被敌机炸毁,未被炸毁者,也先后歇业,致使数十万工人失业,形成严重社会问题。地方协会鉴于此,曾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其中有言“为将来产业复兴计,未便坐视流亡,重蒙损失”,恳请“就本市各区举办各类工人登记,以便将来厂方需要时,得以依类供给。倘能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予公予私,尤有裨益”。^⑫

为使闸北一带的工厂迁入内地,“以期继续生产,备持久抗战之用”,地方协会又设立迁厂委员会,专理此事。此外,地方协会成员颜耀秋、胡厥文还担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正副主任,负责工厂内迁各项具体事项。在消极抗战路线影响下,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的工厂内迁政策,只对少量将来可制造军火的工厂内迁提供资助,而对广大的中小民营工厂毫无兴趣,此举遭到以民族资本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地方协会的竭力反对。1937年9月,荣宗敬、刘鸿生、郭顺、王云五、严裕棠、胡厥文等32人联名呈文行政院,批评政府对内迁一事不力,要求政府力助各厂设法迁移到安全地带照常工作。^⑬10月16日,杜月笙、黄炎培等人又写信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认为对于非国防及小规模之工厂内迁补助费用“稍歧”,要求军事委员会赶紧转呈政府设法补救。^⑭在地方协会等团体的积极响应和推动下,至上海沦陷,共有148家民营工厂迁往内地,这些工厂对保持抗战实力,促进后方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该会还从有关机关团体、企业集中了大小汽车百余辆,负责把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各种军需物资以及救护人员运往前线。

总的来说,尽管这一时期,地方协会的活动是在杜月笙主持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下进行的,是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影响和支配的,但它能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救济救护、慰劳捐募,对支援抗战,形成“前方后方,配合无间”的抗战局面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的,对此,我们不应偏执于其主观动机而抹杀其积极作用。

五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杜月笙、钱新之等地方协会负责人先后去香港,地方协会基本上对外停止了公开活动。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租

界区内成立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并招揽陆伯鸿、顾馨一等地方协会成员参加，为其在租界内成立伪政权作准备。1943年，伪上海市政府考虑到地方协会以往的声誉，曾阴谋袭用该会名义从事活动，并极力拉拢淹留在沪的地方协会会员，但遭到坚定拒绝，阴谋未能得逞。^①

1945年8月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雄心勃勃地力图“宏图”再展，重新恢复昔日在上海的威权。除了整顿、扩充恒社，壮大其私人政治势力外，杜月笙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使地方协会重新公开活动，再现往日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领袖的风光。

1946年2月21日，地方协会召开复员筹备会，杜月笙即席致辞，“上海为国际巨埠，经过敌伪八年来之蹂躏摧残，市政失修，百废待举。应如何规划恢复，晋而为新的建设，凡我市民，实与有责。胜利以后，物价腾踊，工潮起伏，一般秩序，犹未尽入正常。当局虽在积极整顿，而补苴罅漏，尤待全市市民及时协助。就大局言，吾人既已赢得战争，尤须赢得和平。而默察最近大势，波诡云谲，所谓赢得和平，尚待全人类不断之努力。空间距离，益形缩短，天下之大，无殊一家。畛域虽有区分，利害同蒙影响。本会会员，多为各界领袖，今后世界动态，息息相关。对于大局发展，吾人必须集中精力，予以正视”，^②不仅要积极参与地方建设，还要关注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这反映了杜月笙对协会前途的一种乐观，对自身势力的一种自信。

但是，杜月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时环境发生了致命的变化：租界的消失，使他赖以生存的黑社会势力不仅失去了生存、繁衍的基础，而且还失却了帝国主义的庇护；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对上海市政的统一，已经犯不上再用声名狼藉而又极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事实上也是如此。1946年后杜月笙不仅在仕途上屡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而且其赖以依存的黑社会势力也连连遭到国民党的打击。一代大亨迎来的不是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大红大紫，相反，却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悲哀。

作为杜月笙活动工具的地方协会，虽然仍是由上海资产阶级各界精英组成，但经过战火蹂躏

和国民党政府与帮会的联合“夹击”，上海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政治能量、经济识见和独立意识，所以，杜月笙再像以前那样把它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砝码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黑社会势力在上海的逐渐萎缩，地方协会也就越来越失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意义。事实上，1947年6月14日，在中正中路（今延安中路）浦东同乡会杜厅开完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后，^③地方协会的活动也就不再见诸报章。

六

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生存斗争的需要，上海资产阶级选择了杜月笙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而作为上海资产阶级领袖的杜月笙，在参与地方政治运动尤其是抗日救亡运动时，势必要考虑到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某些场合，杜月笙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偶弹异调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杜月笙这个帮会大亨毕竟是依靠国民党政权的权势才得以跻身于上海上流社会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杜充当着蒋介石与上海资产阶级的中间人，而在关键时刻，杜又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发话。随着国民党政府对杜月笙笼络的加强，杜更无心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门神”或“挡箭牌”，相反，在很多场合下，他却成为蒋介石政府压制上海资产阶级的帮凶。这样，在经济上备受摧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多数时候就只有自咽苦果了。

但是，随着战后租界的消失和黑社会势力的萎缩，随着上海资产阶级的失势，杜月笙越来越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其被国民党政权冷落、抛弃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利益与利用，这就是杜月笙、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权三者关系的全部奥秘所在。

注释：

- ①《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 ②白华山：《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 ③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二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09页。
- ④徐铸成：《杜月笙正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 ⑤上海市图书馆藏:《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1932 年)。
- ⑥恒社旅台同仁编:《杜月笙先生(鏞)纪念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 年版,第 18 页。
- ⑦刘才赋:《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8 页。
- ⑧(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1 页。
- ⑨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78 页。
-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黄炎培日记》(1935 年 2 月 1 日,3 日)。
- ⑪《新闻报》,1935 年 2 月 13 日。
- ⑫《黄炎培日记》,1935 年 2 月 19 日。
- ⑬《黄炎培日记》,1935 年 2 月 19 日。
- ⑭《申报》,1935 年 3 月 1 日。
- ⑮(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 128 页。
- ⑯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香港)长江书房,1947 年版,第 5 页。
- ⑰《黄炎培日记》,1936 年 11 月 17 日。
- ⑱《黄炎培日记》,1936 年 11 月 26 日。
- ⑲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6 页。
- ⑳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14 页。
- ㉑苏州市档案局等编:《七君子在苏州狱中》,1986 年版,第 109 页。
- ㉒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4 页。
- ㉓韬奋:《患难余生记》,三联书店,1980 年版,第 50-53 页。
- ㉔胡子婴:《“七君子”狱中反诱降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 82 辑。
- ㉕周天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42 页。
- ㉖周天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75 页。
- ㉗李平书等:《李平书七十自叙 藕初五十自述 王晓籁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5 页。
- ㉘《申报》,1936 年 12 月 15 日。
- ㉙《申报》,1936 年 12 月 18 日。
- ㉚上海市图书馆藏:“会务概览”,《上海市地方协会第三届年报》(1935 年)。
- ㉛“会务概览”,《上海市地方协会第三届年报》(1935 年)。
- ㉜(美)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37 页。
- ㉝拾遗:《杜月笙外传》,(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年版,第 18 页。
- ㉞《新闻报》,1937 年 7 月 23 日。
- ㉟《申报》,1937 年 10 月 11 日。
- 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12-313 页。
- ㊲章君谷:《杜月笙传》,第三册,第 150 页。
- ㊳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47 年)。
- ㊴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45 页。
- ㊵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0 页。
- ㊶㊷㊸《上海市地方协会报告书》(1947 年)。

Du Yuesheng and 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

BAI Huashan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 (SCA) was an important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hanghai political arena in the 1930's.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major activities that SCA led by Du Yuesheng carried out and in which he participated after 1934,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u Yuesheng,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Kuomintang.

Key words: Du Yuesheng, Shanghai Civic Association, the bourgeoisie, the Kuomintang

(责任编辑:藏 峪)